



邢舒绪
著

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宁波学术文库

07JDZ01N

邢舒绪
著

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研究 / 邢舒绪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08-16061-2

I. ①邵… II. ①邢… III. ①浙东学派—研究 IV.
①B244. 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152 号

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研究

邢舒绪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王荣鑫

责任校对 张一弛 田程雨

封面设计 木 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86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061-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前 言

明末清初是浙东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因朝代更替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大量遗民选择了退居乡野,以教书育人、传扬学术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态度和思想的方式,加之浙东自宋代以来就是学术——尤其是陆王心学——重地,因此这一时期浙东涌现出了一批学者和思想家,如刘宗周、周汝登、黄宗羲等等。在这一风潮之中兴起的姚江书院派,在当时便是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与刘宗周的蕺山学派并称为两大王学派别,它自明末至康熙中期绵延了百年之久,而邵廷采就是姚江书院派的集大成者,是姚江书院派成就与影响最巨者。但是长时期以来,相较于蕺山学派而言,无论是姚江书院派还是邵廷采,均未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甚至一度湮没无闻。虽然有章学诚的推崇在前,梁启超的表彰在后,但学术界对于姚江书院派与邵廷采,似乎都进入了一种盲视状态。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港台的学者先开始关注邵廷采,香港的何冠彪,台湾的吴志铿、吴季霏先后发表《邵廷采思想研究》《邵廷采的史学》等文章。随后内地学者也先后开始出现对邵廷采的研究,研究者以浙江学者为主,如沈敏之、钱茂伟、丁国顺、唐燮军等。与港台学者不同的是同地学者在研究邵廷采时,同时注意到姚江书院和姚江书院派的问题,从而将研究视野放得更宽,这些学者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邵廷采的史学思想、邵廷采的学术成就以及姚江书院派问题的文章。其中研究最称全面的当属钱茂伟《姚江书院派研究》一书,全书分“研究篇”和“资料篇”两部分,对姚江书院、姚江书院派和邵廷采分别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书中的“资料篇”部分将研究姚江书院的第一手资料《姚江书院志略》进行了标点整理,使得此后的研究工作有

了可直接参考的珍贵资料,可说是对姚江书院、姚江书院派研究甚至整个浙东学术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本书中关于《姚江书院志略》的引用,即来自钱茂伟的标点本。

尽管学者们先后对邵廷采和姚江书院派进行了上述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至今为止对邵廷采、对姚江书院、对姚江书院派进行一个整体性的、全面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学者或论著,尚且阙如,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初衷。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无论是姚江书院派还是邵廷采,在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史上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及影响,对他们进行一个全面而整体的研究不仅是对姚江书院派和邵廷采的更加深刻地发掘与认识,对了解整个浙东学术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本文的写作意图,就是对邵廷采和姚江书院派进行一个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不仅是前人已反复论述过的邵廷采的史学,更重要的是对前人关注较少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和邵廷采的理学思想进行研究,力图使读者看到一个比前人研究更细致、更深刻的邵廷采。同时,对前人研究中有所争议的问题本文也试图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以求达到文贵一家之言。

笔者对邵廷采的关注最早亦是受仓修良先生的启发,跟随先生门下多年,所受先生的种种关爱教诲心中始终铭记。先生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直至我毕业后还屡次提起:邵廷采是浙东学术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值得研究。先生之言虽在耳,但是面对前人已做出的成就,难免迟疑。最终因不敢辜负先生嘱托,无论如何都要成一书以回复先生,就有了现在这部书。本书立意即在于详前人之略,补前人之疏,虽然仍难免疏漏,但倘能够于邵廷采和姚江书院派的研究有所补益,即是心中所安,也期待其他研究者的批评与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邵廷采的生平	(1)
第一节 家世出身	(1)
第二节 曲折求学	(3)
第三节 坎坷经世	(7)
第四节 勤奋著述	(14)
第二章 邵廷采的史学	(25)
第一节 《东南纪事》《西南纪事》	(25)
第二节 《思复堂文集》	(36)
第三节 邵廷采的史学成就与特点	(49)
第三章 邵廷采的理学	(81)
第一节 明代浙东王学的分化及流传	(81)
第二节 朱学与陆王心学的异同之争	(87)
第三节 邵廷采的理学思想	(103)
第四章 邵廷采与姚江书院派	(121)
第一节 姚江书院的发展过程	(121)
第二节 姚江书院派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活动	(136)
第三节 邵廷采的集书院派之大成及对章学诚的影响	(148)
结 语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65)
索 引	(167)

第一章 邵廷采的生平

作为姚江书院派的重要一员,邵廷采的为学、思想及平生履历事迹,尤其是他之所以能屡遭困顿而不移,几乎倾毕生心血著作存南明史迹与南明人物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和《思复堂文集》,都是与其家世出身、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

第一节 家世出身

邵廷采名行中,字允斯,后更名廷采,字念鲁。清顺治五年(1648)生于故乡余姚通德门之清风里,时余姚属绍兴。据廷采自述,余姚邵氏乃北宋名儒邵雍之后,北宋南迁时,邵雍之孙邵溥随宋室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邵溥玄孙邵淳又自临安迁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又到邵淳的曾孙邵忠时,复自会稽迁至廷采的出生地余姚清风里,余姚邵氏自此而始。^① 而且在余姚,邵氏亦属当地大族望姓,并且诗书传家,盛于科举,“邵氏之在余姚,不能与孙、王、谢三姓齿,而科甲之目独盛于明,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②。虽然到廷采出生时,因为明清朝代更替、廷采曾祖早亡而人丁寥落等原因,邵氏家族已较没落,但仍然是一个书香门第。可以想见这种家世背景对邵廷采应该有很深刻的影响,廷采一生虽然屡遭困厄,并矢志于南明史学及人物

① 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47页。

的研究著述,但与此同时,在共六十几年的人生中他十次参加科举,且常以经世自励,这执着于科场的个中情由,恐怕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养家之难所致,复祖宗神采、重焕家门荣光,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邵氏一门不仅家学渊源深厚,且大都廉洁自律,为清白吏,秉承清正家风。“邵氏文章勋节不甚传而吏多清白,子孙慎守经术,以俭为师,虽累世贵宦而族无富室,此其家风其可称述者也。”^①邵廷采对自己祖上家风的这番陈述,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廷采据祖上行为事迹,作《五世行略》,记载了自五世祖邵远开始直至父亲邵贞显的家族繁衍及家风传承,清能吏治和清正家风于文中昭然可寻。如五世祖邵远(后改名甄)曾任固始县令,“在县七年,境无奸盗,百废修举”^②,后迁海州郡守,又修州城,废弊政,开水利,募民屯田以积谷备荒,是一个颇受海州人敬重的能吏。又如四世祖邵钦谕(后改名伯棠)任靖州郡守,“屏去察政,专用清静,缓税均徭,弛禁蠲赈,羁犷皆乐业”^③,也是一个颇有清名的循吏。因此可见,廷采对自己祖上家风的记述并非虚张夸大。不仅为官清正,邵氏一族还以孝悌传家,颇具孝义之风。如廷采五世祖邵远之学乃出自其兄邵培,后邵培死于杭州,邵远不顾倭患之乱,自南京兼程赶往杭州奔丧,且在日后将邵培三个儿子培育成人。四世祖钦谕也是“友孝笃诚”,尤其对母亲十分孝顺,“母孺人积岁病挛,抑搔扶持,靡有倦怠意”^④。廷采祖父邵曾可更是事母至孝,“作婴儿啼笑以娱乐焉”,又“一姐早寡,奉如奉母”^⑤。廷采之父贞显,也同样“奉大父教甚谨,晨夕动定,每事秉承”^⑥。廷采还记载家族的几代叔祖、伯祖之间,无不是和睦互处,以孝义当先。

不仅如此,邵氏的女性家族成员,自廷采的曾祖母翁氏夫人,祖母孙氏,至廷采的生母陈氏、继母章氏,无一不是贤孝恭良,倍有贤名。尤其是祖母孙氏,母家乃余姚大姓,世代以文章忠孝传家,被称为海内宗臣,其六世祖孙燧,明武宗时为副都御使巡抚江西,他察觉到宁王朱宸濠将会叛乱,因此提前修筑城池、调兵分守江西要塞,又准备兵器装备,为后来王阳明平叛胜利

①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47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48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49页。

④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50页。

⑤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52页。

⑥ 《思复堂文集》卷一〇《五世行略上》,第458页。

做了重大贡献。而且他面对朱宸濠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终惨遭朱宸濠杀害,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孙燧后人孙文融,是万历甲戌进士第一名,在当年的援朝之役中,孙文融以副都御使的身份巡抚山东,因而自登州、莱州的军饷转运不绝,保障大军的后勤供应。又进献防海图,反对议和,主张与日军决战,彻底断绝日本的侵扰后患,后又亲自督军直捣倭寇老巢,使明军军威大盛,最终官南京兵部尚书。又如其族兄孙嘉绩(文善常《邵廷采史学研究》以孙嘉绩为廷采祖母之胞兄,但廷采《孙氏世传》详载,孙嘉绩乃孙景贤之孙,祖母则是孙一之的孙女,文善常有误),在明朝沦陷后,招募乡勇,北上抗清,宁死不降。这种讲孝义、重廉耻,以忠孝传家的家世门风,对邵廷采的思想有极大影响,《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和《思复堂文集》中大量篇幅都是记载晚明的忠臣贤士、孝义贤良,这与邵廷采自小耳濡目染的家庭影响应该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曲折求学

邵廷采出生后仅六个月,母亲陈氏便离世,廷采主要由祖母孙氏夫人抚育成长。孙氏对廷采教养甚严,且常对廷采讲起祖上忠勇节烈的事迹,这对廷采日后思想的形成,或许起了重大作用。而廷采的读书为学,则始受教于祖父邵曾可。邵曾可初名邦琳,字林玉,后改名曾可,字子唯,号鲁公,就学于姚江书院创始人管宗圣及史孝咸,与子邵贞显同是姚江书院派成员,且被称为书院高第。五六岁时,廷采便开始秉承祖父之训,“教以孝悌忠信、为人之方”^①,六七岁时,祖父便带着廷采出入于姚江书院:“孙廷采甫六七岁,率诣书院翻示先儒书,曰:‘小子今未能读,异日庶沉思静观之。’”^②八九岁时,祖父已开始教廷采读书之法和学问宗旨,廷采回忆道:“八九岁从王父鲁公府君受阳明《客座私祝》,府君即欲教以圣贤之学,非儒者之书勿使见。是年,始记周、程、张、邵、朱及白沙、阳明、曰仁、绪山、心斋、东郭诸君子姓名。”^③这应是廷采接触经学及浙东学术之始,并且日后他对浙东和姚江学术的深厚感情,也应该是由此时奠基而来。不仅如此,这年祖父更带着廷采拜

①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② 《思复堂文集》附录《陈执斋先生:邵鲁公先生孙孺人墓志铭》,第518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六《文艺序》,第305页。

见过姚江书院的元老史孝咸和沈国模,并受到了沈国模的亲口教诲,对此廷采自言:“自幼九岁,从鲁公府君至城南姚江书院。及见求如沈先生,谓曰:‘孺子治何经?’对曰:‘方受《尚书》。’沈先生摩其顶曰:‘孺子识之:在知人,在安民。’”^①不仅祖父、父亲皆为史氏高足,现在廷采又得到史氏的亲口教诲,这种经历是姚江学派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这既是廷采与姚江书院派结缘的起始,也是他日后一生都对姚江学术感情深厚的原因。

清顺治十五年(1658),邵廷采十一岁,祖父邵曾可到皇山的翁氏山庄教书,廷采跟随祖父一起前往,并开始跟祖父学习制义,祖父为廷采作《蒙说》,且亲自讲解教导。万经在所做廷采传记中说:“十一岁,从鲁公讲业于皇山翁氏庄,书课制义。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皋,训以孝悌忠信,夜则共卧。宽严得中,诵说有法。”^②然而不久,因为史孝咸病重,邵曾可敬重恩师,每天往来十余里进行探望,且不食而回。如此一个多月,在史孝咸病故之后,邵曾可的身体也终于承受不住而病倒,这年冬天的十一月二十二日,邵曾可也最终不治而卒,终年五十一岁。祖父的去世,不仅使邵氏的家庭受到沉重打击,更给邵廷采带来无尽伤痛,廷采自幼跟随祖父,不仅学业始于祖父,与祖父之间的感情更是深厚,他多次在文章中提及祖父,对祖父的学问人品充满敬仰,为了表达对祖父的怀念和敬仰,后来廷采将自己的字更为念鲁,由此也可可见他对祖父的深情。但现在祖父的去世,不仅感情上悲伤,更重要的是廷采的生活与为学之路也出现了曲折。

祖父去世的第二年,邵廷采十二岁,祖父的去世使得家里的生计显得日益窘迫,因此廷采的父亲邵贞显决定到浙西的石门(今桐乡)教书。邵贞显的人生也颇为不幸,在儿子廷采出生刚六个月时,贞显的妻子陈氏便去世,当时陈氏只有二十一岁,贞显也只二十三岁。两年后邵贞显续娶了夫人章氏,并在第二年生下廷采的弟弟行正,章氏对待廷采十分疼爱,视如己出,邵贞显和家人对章氏十分满意,但同样不幸的是仅过了八年,就在廷采祖父去世的前一天,章氏夫人也因病而先逝。这时的邵贞显也只不过三十三岁,却已连续失去两位妻子,因此他对婚姻有些心灰意冷,无意再娶,再加上为生计想,便决定到石门。因为父亲离家,缺人照料和教导,邵廷采只好到了外祖父陈正衍家,从外祖父学习经义,“从先生学经义,遂受《左》《国》、马、班

① 《思复堂文集》卷六《师训序》,第303页。

② 《思复堂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第535页。

文”^①，并开始接受史学教育。陈正衍乃南宋宰相陈康伯之后，其曾叔祖陈有年则是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任御史、贵州巡按、河南巡按、松潘巡抚、应天巡抚等职，累官至吏部尚书，且陈有年为官清正，颇有政声，被赞为风节高于天下。陈正衍颇受其祖上遗风影响，入清后布衣终身，不为清朝效力，“衣冠汉仪”，“言及祖德国恩，涕泗交下”^②，是一个讲忠孝、有气节的明末遗民。此外陈正衍“博览典文，精研性理，尤好《左氏春秋》、司马迁《史记》，旁及《昭明文选》，穷竭硃墨，以致自娱”^③，也是一个对史学情有独钟的人。自十二岁起直到十六岁，邵廷采在外祖父家寄居了有五年之久，可以想见这期间外祖父的学问思想肯定也对廷采产生了很大影响，廷采一生重史，且致力于对明史的研究，这与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应该是分不开的。

康熙二年(1663)，邵廷采十六岁，离开寄居五年的外祖父家，到石门投奔在此地教书的父亲邵贞显，且跟随父亲读书。在此时廷采对史学的偏爱开始显现出来，他自己回忆说：“仆十六岁从先君读书御儿，即私取马氏《通纪》，戏为编次，立中山、开平、曹国诸传。先君覩视微哂，若为弗知而不之责。后遂贪阅《纲目》《史记》，暨《吾学》《从信》《宪章》等书，自觉性与之史近。”^④且自此之后廷采对史学的钟爱一直不移，这也是他穷其一生进行明史研究的动力之一。

十八岁时，邵廷采在家乡余姚，因无师指导，便在家自学，当然最爱读的，还是史书，他说：“十八十九两岁，抄录明史无昼夜。”^⑤但是因为缺乏名师指点，廷采觉得自己进步并不大，“私启先君篋，纵观古今书籍。然不精专，迄无所得”^⑥。又说：“益性喜抄阅明史，然无师指授，空自劳攘。”^⑦其实邵廷采一生的学问之路，基本都是处于这种无师指导、自学自进的状态，这既和明清交替时期学术发展寥落的时代特点有关，也和廷采一生生活艰辛、疲于奔波生计，而无法专心拜师读书有关。

康熙六年(1667)，邵廷采二十岁，正式拜姚江书院派前辈韩孔当为师，开始学习阳明之学。关于廷采拜师韩孔当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尚存争

① 《思复堂文集》卷十《外大父陈蜀庵先生墓碣》，第434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一《陈恭介公传》，第63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一《陈恭介公传》，第63页。

④ 《思复堂文集》卷七《答陶圣水书》，第322页。

⑤ 《思复堂文集》卷七《答陶圣水书》，第322页。

⑥ 《思复堂文集》卷六《文艺序》，第305页。

⑦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议。廷采自序：“年十七，始受业先师韩夫子之门，讲阳明之学。”^①而万经在《理学邵念鲁先生传》中，则说：“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辈韩孔当，孔当教以静坐。”^②朱筠作《邵念鲁先生墓表》，则认为廷采九岁即拜韩孔当为师：“九岁读史，即操槩为徐达、常遇春传有法……祖以为有志，即为具衣冠送之姚江书院……是时沈国模年八十矣，尚在，岁必一再至，为诸生设讲。先生立阶下听，久之，执所业《尚书》前曰：‘孩提不学不虑，尧、舜不思不勉，同乎？’国模叹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从孔当受业。”^③邵国麟《念鲁先生本传》，又说：“康熙初，姚江讲学诸儒若沈、史、韩辈，朔望集书院，先生均师之。”^④姚名达先生作《邵念鲁年谱》，认为沈国模在顺治时已故，因此邵国麟康熙初之说最误。同时又认为廷采对自己读书从学经历所述甚多，但从未提过少年时对良知之学的见解，因此朱筠九岁说也实为浮夸之说，故姚名达采用十七岁之说，认为廷采十七岁拜师韩孔当，二十岁时则是随韩孔当学习静坐之时。但同时姚名达对万经二十岁之说又未十分否定，说：“万说虽稍近情，肆诸阙疑待证之列，可矣。”^⑤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则采二十岁之说，认为廷采十七岁时为康熙三年（1664），这时韩孔当尚隐居在家，不曾公开讲学，因而不可能发生廷采拜师之事。直到康熙六年（1667）韩孔当在余姚开城隅会，出面公开讲学，廷采才在父亲邵贞显的指示下，发生拜师之事。对此笔者则以为，廷采自序十七岁之说应该最为可信。一来邵廷采对自己从学经历多次提及，而且所述甚详，再加上廷采一生从师、交游的经历其实有限，不太可能对拜师之事出现记忆错误。二来廷采拜师韩孔当是遵从父亲之命，而廷采十七岁自石门父亲处归家，归家之际父亲为了廷采的读书学业考虑，命他拜师韩孔当，因而拜师在这一时间应该是最合理的。第三，关于韩孔当在康熙三年（1664）廷采十七岁时尚隐居在家，因而无从拜师之事，笔者则以为廷采自幼跟随祖父出入姚江书院，与韩孔当早已熟识，因此拜师之事即使韩孔当当时隐居在家，于廷采来说也应该是无碍的。第四，至于廷采自序十八九岁在家读书时无师指授，及二十岁才出现随韩孔当学习静坐之事，笔者以为正可以用韩孔当康熙三年城隅会的讲学来解释。

① 《思复堂文集》卷六《师训序》，第303页。

② 《思复堂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第535页。

③ 《思复堂文集》附录《邵念鲁先生墓表》，第546页。

④ 《思复堂文集》附录《念鲁先生本传》，第533页。

⑤ 姚名达：《邵念鲁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廷采十七岁拜师,当时因韩孔当尚在隐居,所以即便拜师之后廷采基本也是以自学为主,而到康熙三年韩孔当公开讲学时,廷采便也开始跟随在韩孔当身边,正式学习阳明之学,这一解释应该是合理的。

据上所述,笔者以为十七岁之说最可信。而之所以将此事放在廷采二十岁时来讨论,是考虑对拜师诸说进行综合的排列、梳理与分析后,再进行最终的探讨,以求得最后的结论,并候教于方家及后来者。

康熙六年(1667)到七年,是邵廷采跟随韩孔当学习的主要时间,也是廷采集中学习阳明之学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廷采的学习非常认真,“月赴小会,归治经书,竟日闭楼,默不出声。或家事繁杂,则走读四明山楼,越溪渡冈,不以为疲”。并且这段时间廷采经学的进步也是非常大的,“一日,孔当问曰:‘尧、舜之道在孝悌。孝悌亦不易尽,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其说云何?’先生对:‘孩提之不学不虑,即尧、舜之不思不勉否?’孔当怡然悦曰:‘良知宗旨,被汝一语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只此,子归而求之,真有余师矣’”^①。

第三节 坎坷经世

康熙八年(1669)二十二岁时,邵廷采又来到石门父亲处,据父亲贞显所记,廷采这次也在石门儒学教谕陈祖法家做了家庭教师。陈祖法与邵家是姻亲,陈祖法的妻子和廷采的祖父邵曾可乃是表兄妹,且陈祖法与邵曾可也是自幼便相识,因此,陈祖法对廷采也甚是关照,关照的表现之一,便是廷采虽是余姚人,但却能够在石门县学得补诸生,也就是可以以石门县学生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这在户籍制度规定甚严的当时,是很引人注目且易引起不满和批评甚至攻击的,但是最终通过陈祖法的活动,邵廷采终于过了冒籍这一关,开始了他此后长达几十年的科举之路。因为廷采对科举并无多少兴趣,所以在科举之路上虽然蹉跎了几十年,屡败屡战,却始终未能取得成效,屡战而屡败。廷采自述:“二十二为诸生,从事举业。以为非向上功夫,此意扞格,久不进。”^②邵廷采的这番自述并非是故作姿态,为自己找寻借口,究其一生来看,他确实笃志于圣学及史学,在圣学和史学上孜孜不倦,而

^① 《思复堂文集》附录《理学邵念鲁先生传》,第536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对于科举一途,的确并不看重。

就在这一年,姚江书院在因沈国模、史孝咸过世而辍讲了十余年之后,在韩孔当的主持下重新开讲。邵廷采虽然不经常在余姚,但是对姚江书院的讲学活动却很关注,也很有热情,对于韩孔当重开书院的这一行动他大加称扬,说:“自沈、史两先师没,书院辍讲竟十年。先生(指韩孔当)挽其坠绪,旧人新进翕然咸来问学,弟子至七十余人。持论较师说亦颇阔,恪遵濂、洛,兼综群儒,以名教经世指勖学者。”^①而且廷采也参与了书院的活动,“幸侍先师韩子,月季再会,重续沈、史之席”^②。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邵廷采有机会在读书之余又能够和师长学友相互探讨切磋,“获从同人之后,日侍先师,益沈、史先生余论,复奋然志自勉,以几有成”^③。自己的学问也有了不小长进。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第二年即康熙九年(1670)的八月十五,廷采的父亲邵贞显病故,年仅四十五岁。邵贞显自幼因为患胃病,身体一直不好,廷采自述其父:“幼患胃病,体貌枯侵,须发先白。”^④张五皋为邵贞显作墓志铭,亦云其:“貌侵,身长不及中人。”^⑤其实,邵氏家族中人的身体素质都不太好,廷采的曾祖邵洪化,以二十四岁的壮龄,却在上府学应试时,因为一场大雨被淋,结果很快就病卒。廷采祖父邵曾可,“生而善病,濒死者数”^⑥,多亏母亲翁氏的百般调护,才得以存活,然最终病歿之年,也只有五十一岁。廷采的父亲又是如此状况。邵廷采自己,身体也是非常不好,屡次患大病,几至歿亡,对此后文将会有叙述。廷采继母章氏所生的弟弟行正,年仅十三岁而病亡。不仅男性如此,邵氏家族的女性也似乎同样多灾多难,廷采的生母在生下廷采六个月后病故,年仅二十一岁。继母章氏嫁到邵家八年,因病耳失聪,最终亡故,终年也只有二十七岁。廷采自己的前妻龚氏,三十二岁时因难产而亡。如此种种,给邵廷采的人生都带来了许多坎坷磨难。而这次随着父亲的病故,养家糊口的重担便落在了邵廷采的肩上,也使得他的人生走入了另一个阶段。

父亲死后,邵廷采为养家计,到了会稽道墟章氏家,教授章因培、章芬木

① 《思复堂文集》卷一《姚江书院传》,第55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③ 《姚江书院志略》卷下《读六子传志感》。

④ 《思复堂文集》卷十《五世行略上》,第453页。

⑤ 《思复堂文集》附录《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陈氏章氏墓志铭》,第522页。

⑥ 《思复堂文集》附录《谢孔渊:邵母贞懿翁太孺人传》,第516页。

二兄弟,做了章家塾师。此时廷采二十三岁,却在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后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丁,承担起了赡养祖母、养育妻小的家庭重任,这一责任也成了邵廷采此后一生的重担,为他带来了更多人生与学术上的坎坷。

邵廷采在道墟教授的时间并不长,仅一年有余,但在此期间他教书之余,也开始在他一向钟爱的史学方面动手写作。他仿效《史记》《汉书》的论、赞,作了《读史百则》,不过却因为朋友有“未作纪传而先为论赞,才方古人远矣”的戏谑,在百则之后的短时间内他并没有继续写下去。不久,老师韩孔当忽然因病去世,老师去世后邵廷采作了《姚江书院传》,表达了对姚江前辈的崇敬之情,但这之后他却在很长时间内脱离了姚江书院的讲学活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老师去世后邵廷采觉得内心失去了依靠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艰难辗转,养家之故。

康熙十二年(1673),邵廷采又到了嘉兴教书,在嘉兴,廷采遇到了一个对他此后有很大影响的前辈学者施博。施博号约庵,明亡后常寓居于东塔寺,终身不着清代衣冠,并且与黄宗羲有学术上的往来。晚年施博在嘉兴南湖的烟雨楼讲学,喜欢接引后进学者,被称为施先生。邵廷采拜见了施博,施博因为十分推崇当时的大儒、《理学宗传》的作者孙奇逢,便向廷采推荐孙奇逢的《征君语录》。廷采读到孙奇逢书中说:“朱子之后流为支离,故阳明当药之以虚;阳明之后流为佛、老,在近日当药之以实。”^①深以为然,自称从此后始识儒、佛之分。而此后廷采对阳明之学多有辩证,批评王学后人王畿为禅,应该是有读施博所赠《征君语录》的影响的。除讨论学术之外,施博对廷采留意明朝史迹的行为大加赞赏,勉励廷采:“为世道留意,追踪前贤。”^②廷采深受鼓舞,由此产生了以天下自任的经世之志,“滥蒙奖许,勉以经世事业。此后意愿渐广,交游道杂,勇侠轻非之士漫相标重”^③,颇有经世天下的自负与抱负。而此后的十年之间,廷采也确实实践了这一抱负,其后辈、学者邵晋涵说廷采“从同邑黄宗羲问《乾凿》度算法,从会稽董场受阵图,从保定王正中学西历。将军施琅振旅台湾,先生遇之西湖,纵谈沿海要害……游镇江,梁化凤部将习坐作击刺之法,匝月尽其技。游淮北,从河防老卒,问河淮变迁。径走河南,访黄河故道。策马出潼关,观形势,叹曰:‘土则古所耕也,而水利不复,奈何?’”这些都是邵廷采经世之志的表现。虽然后来廷采

① 《思复堂文集》卷三《征君孙钟元先生传》,第169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第217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经世之志变冷淡,心思重新回到学术上来,“久乃自悔……退与朴茂者居处。十年以来,重理初志,窃欲肆力于史”^①。但是施博对廷采一生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对施博也十分尊重,将其与韩孔当一起,称为平生二师。

但是邵廷采在嘉兴的时间,也同样只有短短一年,康熙十三年(1674)廷采又来到了会稽的陶氏家中,教授陶氏二子陶文焕和陶峒读书。这次,邵廷采在陶家坐馆达六七年之久,是他一生教书生涯中待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并且在此期间廷采和陶氏一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不仅与陶氏以朋友相处,而且在前妻龚氏因难产而亡后的第五年,廷采续娶了陶氏妻子章孺人的侄女,与陶氏一家也成了亲戚,这大约也是廷采能在陶家时间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在会稽的这段时间对邵廷采来说有重要影响和意义,一个是他与董场的交往。董场原名董瑞生,字叔迪,后改名场,号无休,明亡前曾极力研习兵事,企图救国。明亡后,他削发为僧,全心研究刘宗周之学,校录《戡山刘子全书》,并且重启证人书院,讲戡山之学,是一位当时在绍兴很有影响的遗民学者。不仅如此,董场与廷采的业师韩孔当关系也十分亲密,私交甚深,韩孔当主讲姚江书院时,还请董场帮他订立了《书院规要六事》,指明姚江书院的立学宗旨,对此后文将有细述。邵廷采与董场的结识其实是在他坐馆陶家之前,当时诸暨、嵊县兵乱,廷采为避祸而寓居于董场家,这是他与董场的结识之始。而之所以能到此前并不相识的董家去避乱,恐怕和韩孔当与董场的交往有直接关系,否则怎么可能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家里去避难。在董场家,廷采被告诫:“既宗戡山之人,不可不知戡山之学。”^②后来廷采喜读《刘子全书》,对其下过功夫,这和董场的教导也应该有关系。同时这次在董家,廷采又读到了毛奇龄的《毛西河文集》,从而对毛奇龄大为敬服,“伏读深思,不能名状,但惊其雄博无涯涘,考核精严,诸体具备。历观当今作者,本原之大未有过于先生”^③。廷采此后屡次提到毛奇龄,对其大表敬意,且特意去毛氏门下拜访,其意也应起于此时。此次在陶家坐馆,邵廷采又再次拜见了董场,董场向廷采推荐遗民陶克己,说陶克己的文章、气节都足以称道,在董场的推崇下廷采三次前往拜访了陶克己,最终得见,对陶克己也是深表叹服。廷采还读到了陶克己所著文章《治原》《民本》等的手稿,并且后来将陶

①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09页。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三《东池董无休先生传》,第178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七《谒毛西河先生书》,第310页。

克己收入《明遗民所知传》。

这段时间里对邵廷采来说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拜见了黄宗羲,并且得到了黄宗羲的指点。作为当时的大儒,而且又同是余姚人,对于邵廷采来说黄宗羲是一个深为仰慕的前辈,这次拜见黄宗羲,邵廷采是带了自己有道墟章氏家教书时所作的《读史百则》前来求教的。^①这次会面,黄宗羲对邵廷采的具体评价及指点情况不详,但是不久,廷采又第二次去拜见了黄宗羲,并且得到黄宗羲所授《行朝录》一编,可见黄宗羲对邵廷采的态度是欣赏的。此后廷采与黄宗羲间应该往来颇多,因为廷采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宋中遗吴门友人书》后,载有黄宗羲对这篇文章所作的评语,为:“逐段零星,文气自贯,章法从《楚昭王复国》篇来。”^②从康熙十八年到二十四年,已经过去六年,黄宗羲还能为廷采文章作评,说明他们之间确实也有来往。而廷采在之后也屡次表达对黄宗羲的敬仰,将黄宗羲称为本邑宿儒,后来更为黄宗羲作传,文中有:“余同里亲炙黄先生,见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辞。及夫意思泉涌,若绝河东注,顷刻累百千言,续属不绝。著述文章,大者羽翼经传,细逮九流百氏,靡不贯通……屹然一代学者宗师。”^③并且他称赞叹服黄宗羲的学问,称其并有情才著述,且“学问渊博,名冠海内。发明蕺山刘子诚意慎独之说,东南学者推为刘门董常、黄榦”^④。可见邵廷采对黄宗羲是十分敬仰的,并且他说黄宗羲对自己“殷勤提问”,教诲良多,表示“难忘是恩”^⑤,也说明廷采在学问上确实得到了黄宗羲的指点。

邵廷采离开陶家的具体时间并不详细,但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邵廷采又来到嘉兴,并且此前一年他在会稽的樊江遇到了曾经游历日本的张五

① 关于邵廷采与黄宗羲初次相见的的时间,邵廷采在自叙中并无明确说明,是后人根据二人见面后会谈的内容进行推测。吴志铨作《邵廷采的史学》,笼统地说是在“康熙十二年以后”,因为《读史百则》是廷采作于康熙十二年在道墟章氏家教书时,所以廷采拜见黄宗羲以《读史百则》请教自是康熙十二年以后。钱茂伟则以为是在康熙十八年,原因是因为清政府在康熙十八年开馆修《明史》,因而《明史》称为当时学术界的热点,邵廷采此时以《读史百则》求教黄宗羲,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本书对此在后文将有所论述。另钱茂伟以廷采自叙此次拜见黄宗羲的目的是“托梨洲先生评语,诚系好名逐外”是出自《思复堂文集》卷十《谢陈执斋先生》,乃是笔误,应为《思复堂文集》卷七。

② 《思复堂文集》卷七《宋中遗吴门友人书》,第321页。

③ 《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第175页。按:点校本《思复堂文集》作“黄榦”,误。

④ 《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第170页。

⑤ 《思复堂文集》卷七《谢陈执斋先生》,第308页。